

一代報人張季鸞

(本文插圖刊47頁)

陳紀濤

撰寫小傳略補遺憾

為報翰林張季子，飄零遺稿竟編成；
于髯今日還詩債，悵望中原有哭聲。
痛心莫論大公报，民立餘馨更可思，
發願終身作記者，春風吹動歲寒枝。

右邊這首律詩，是前監察院院長于右老於民國四十六年九月，拙著「報人張季鸞」一書出版時所寫。右老詩後並有題記：「陳紀濤先生編張季鸞文集成囑題。季鸞籍榆林，大公报發起人，民立舊友也。」記得拙著出版後，我嫌它過於簡略，曾承右老於青田街一號官邸邀集朱宗良、冉寅谷、楊爾瑛三位先生，舉行小規模的座談會，為我補充若干資料，藉供我再有寫季鸞先生傳記時之用。朱宗良先生是監委，常年會與季鸞先生在上海民立報同事。冉寅谷立委是榆林人，自幼就和季鸞先生友善，知道他幼年時期的事情很多。季鸞先生逝世後，他正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楊爾瑛先生也是榆林人，在西北與中央服務多年，季鸞先生逝世時，他正在西安主持青年團團務。冉、楊二氏對季鸞安葬事宜負責獨多。右老那天精神振奮，也講了不少老話。我都一一記起。可惜連年窮忙，以致我要寫一本較完整的「張季鸞

先生」的計畫，竟無法實現；如今不獨右老已作古，連朱委員也離開塵寰幾年了；追懷往事，不禁淪然！現在雖然仍不能全償宿願，但有再一度寫季鸞事蹟的機會，可謂聊勝於無，藉此稍補遺憾，差堪自慰。

畢生服膺報恩主義

先生本名熾章，季鸞是他的號，也是他自當記者以來一般人慣稱他的名字。雖然他印名片，仍用「張熾章」三字。他的名片僅有「張熾章」下綴「季鸞」二字，其餘均無。當國民參政員時也用本名。實際上沒一個人稱呼他本名。他的筆名很多，最初用「少白」（民立、民信時代）。以後用「一草」（中華新報與國聞報時代）。最後用「老兵」（抗戰後的大公报）。因他自幼頭髮有點灰白，故名「少白」。後來南北飄泊，因名「一草」。抗戰以後，因他經常來往於香港、桂林等處，常以「老兵」的筆名寫些通信。大概一生常用的筆名就是這三個。

季鸞先生生於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生於山東省鄒平縣。當時他的父親翹軒先生正任鄒平縣知事。翹軒先生進士出身，深受關中「精思力行」「堅苦卓絕」學風的

影響，所以一生「刻苦自勵」「輕視財商」。在山東遊宦多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歿於濟南。當時季鸞先生才十三歲，住在山東寧陽。他母親是山東人。父親死後，本應留在山東，但他母親不肯。他隨母親扶柩回榆林，把父親安葬於故里。

季鸞先生自幼聰穎絕倫，領悟力極高。十三歲以前已把經書讀完，並博覽羣書，過目成誦，雖然講話有點口吃，但已能寫得一手好文章。正好清廷派陳兆潢任榆綏道道臺，陳氏非常賞識季鸞先生的才學，就把季鸞先生接到道臺衙門裏去跟他讀書，這位道臺老爺漸漸感覺這個學生才氣過高，自己肚子那點油水，不能够壓足這位青少年的求知慾，於是就資助他去長安（西安）入味經書院，投師於咸陽大儒劉古愚的門下。後來劉古愚辭館不幹，移席醴泉九稷山烟霧草堂講學。劉氏邀季鸞先生前往，繼續授課。前後共有三年之久。這一段時期，季鸞先生除重溫經書後，特別對於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以及史書用功最多也最深。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二月，季鸞先生又轉學到三原宏道高等學堂肄業。不幸入學未及兩月，他的母親又因病去世，才三十七歲。所以他幼年時的孤苦情形，鑄成他一生「報恩主義

」的思想。在爲他父親百年紀念與他母親三十週年忌辰所作的「歸鄉記」內，有極動人的描寫：

「我父親魏軒先生是一位老進士，一世輕視財商，庚子冬六十六歲上，病故濟南。那時家眷住寧陽縣，我只十三歲。得計之後，同先三兄大合姪，即日奔喪，時值殘歲，在大風嚴寒中，馳驟放行三日，趕上啓棺含殮，哭拜最後的遺容。這一幕悲劇，三十幾年來，常常憶起，常常悲痛。

先母王太夫人是續配，是一位極慈祥平和的女性，母家住山東沂水縣，先父去世後，一貧如洗，多勸她就住在山東，先母不肯，一定要扶柩歸葬。領着小兄妹三人，到沂水拜別了先外祖父母。辛丑冬，帶全家回榆林，一路的困難不必說了，到家即發生生活問題，全家箱篋中，只有幾只元寶。有一處夥開的商業，被人乾沒，成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又死了我一個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壽。我最後見面是清光緒三十年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學堂，臨行拜別，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誰知即成了永訣！到校兩月，即接計文，待我奔喪到家，只見在寺院傍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歲，今若在，不過六十七歲。三十年想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如何的悲哀！我的家世，大概如此。這二十年中，兄嫂皆故，男女兄弟共八人，現在只餘我與季妹、姪共三人，只大姪健在。家庭種種的不幸，常常使我感到對先世對父母的重大責任。我的人生觀，是很迂淺的。簡言之，可謂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我以爲如此

立志，一切只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省多少煩惱。不過，我並無理論，不是得諸注入的知識，是從孤兒的孺慕，感母親恩報，國恩更不可忘；全社會皆對我有恩，都應該報。現在中國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們報恩報國，免教萬代子孫作奴隸！人們若常常這樣想，似乎易於避免墜落。這是我的思想。」

鐵窗百日文名鵲起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張氏年方十七歲。陝西省舉辦留日學生考試，先生被錄取。但因爲補習日語，直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張氏二十一歲，才東渡日本入東京第一高等學堂，習政治經濟學科。因先生才學兼備，吸收力極強，學業猛進，爲同學之冠。是時胡霖（政之）、吳鼎昌（達詮）二氏也在東京肄讀，且與政之先生爲同學。

當時，國父中山先生在東京倡同盟會，季鸞先生就首先參加。後來他雖未正式成爲中國國民黨員，但實在則是國民黨的前輩，且是最緊密的黨友。那時節，他並爲陝西省留日同學出版「夏聲」雜誌撰稿。張氏後來投身於新聞界，與在東京時開始發生興趣寫文章，有莫大關係。

民國元年，張氏二十四歲。他自日本歸國在上海參加于右任先生所主辦的民主圖書公司。民主圖書公司最初計畫很大，想辦許多文化事業，但民元僅發行民立報。右老與季鸞先生是大同鄉，對他非常器重。鼓吹革命、提倡維新的文章大都出自先生之手。民元四月，臨時政府由南京遷

北京，張氏爲發揮輿論效能，又與曹成甫先生同去北京另創民立報，以期南北呼應。不久，宋教仁案在滬發生，季鸞先生在北京民立報發表激烈文章，抨擊袁世凱爲宋案之主使人，被袁拘捕下獄，曹被殺害，張氏被囚三個月後才獲釋。出獄後他與陝西同鄉康心之（寶忠）同去上海，在「雅言」月刊上，撰「鐵窗百日記」，稱頌一時。

于右老曾於抗戰爆發後二年（民國二十七年）作詞紀念張氏繫獄二十五周年。文曰：

（雙調折桂令）危哉季子當年，灑淚桃源，不避艱難。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心肝。弔民立餘香馥郁，說袁家黑獄辛酸。則如今大戰方酣，大筆增援。廿五週同君在此，紀念今天，慶祝明天。」

右任詩存

張氏到了上海以後，「落拓無聊」，當時胡政之先生正主持大共和報，他被邀參加工作，主要職務是任譯員，翻譯日本通訊社的電稿及書報，並協助寫社論。爲了生計，不得不兼職在吳淞開辦的中國公學，張氏講授西洋史。後來當了新疆邊防督辦的盛世才氏，便是當時的學生之一。盛氏常跟筆者形容季鸞先生授課的情形，說他從來不拿課本，一直背着講，源源本本，娓娓動聽，引起學生們莫大興趣。盛氏坦白承認自己對於西洋的那點知識，還是根源於張氏的授課。可知張氏不但舊學好，新學也好；不但日文好，英文也不錯。（英文是他在日本所學的第二種外國語，時間雖不長，但由於天才高，所以很够用。）

中國公學講課與參加大共和報工作大約共有一年半。民國四年，他又與康心之等在上海創辦民信日報，擔任總編輯，繼續揭發袁世凱禍國陰謀，不遺餘力。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以實行洪憲失敗致死。民信日報也從此結束。他又跟康心之北上接辦中華新報。季鸞先生有了幾次參加報業經驗之後，除業務由康氏主持外，其餘無論筆政與採訪都自行兼任。合算自民元起至民國七年，季鸞先生時而上海，時而北京，先後參加民立報、大共和報、民信日報與中華新報，可以說非常動盪不安。這一時期，他曾兼任上海新聞報的記者，署名「一葦」。到了民國八年，他又捨掉北京中華新報，到上海創辦同一報紙。為什麼這樣忽南忽北？說穿了，就是因為那時的政局太不穩定，而獻身新聞事業的人又無雄厚資本，藉能持久；當時全憑一股文人報國、文人論政的超然熱情，來達目的。譬如他第二次入獄，是因為

北京中華新報刊載了安福系政府與日本有山東高密鐵路二千萬元密約的新聞，觸怒當時段派權貴徐樹錚，下令七個報館被封閉，中華新報即其中之一。張氏因以入獄，但未久即獲釋。張氏既在北方二度有縲絏之災，且康心之等的經濟基礎尚十分脆弱，於是不得不移師滬濱，另謀出路。季鸞先生署名「一葦」，多少有點自悲自歎之意。但這些經驗，都有助於後來他跟胡政之及吳達詮兩先生之合作共同創辦大公報的企業精神。

全副精神灌注報業

民國八年，胡政之先生是中國唯一採訪巴黎

和會的記者。那時新共和日報已停刊。這次成功的採訪給他帶來了新聞事業的新境界與雄心。於是決定在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國內外新聞通訊社）與季鸞先生的中華新報為鄰（好像是九江路），兩個人又住同里（英租界）。這段時間，他倆接觸機會較前增多。據我所知，國聞通訊社最初襄助胡氏的有李子寬及何心冷二人。後來子寬仍留滬主持通訊社，心冷則北上助理大公報編輯事務。

民國十三年冬中華新報因故停刊。季鸞先生被迫離滬北上。政之先生爲了充實國聞通訊社的基礎，也長期住在北方。這時吳達詮先生投身金融，已有深厚基礎，對於創辦新聞事業，賦卓越的見解與濃厚興趣。在上海時候，他們三個人時常聚在一塊兒，暢談新聞事業所需要的條件。他們共同認爲「須有獨立資本，集中人才，全力爲之，方可成功。」

民國十四年國聞通訊社支持不下去了，政之先生打算停辦。吳達詮先生覺得停辦了很可惜，跟季鸞先生商量，他也覺得國聞通訊社是當時唯一有成就的通訊機構（記者遍全國通商大埠，各報都採用該社新聞稿件，其規模之大，比中央通訊社初期尤有過之），倘從此停辦實在可惜。於是倡議另創「國聞週報」，期以週報維護通訊社。但因季鸞先生去北方，沒能够實現。但「國聞通訊社」因吳達詮先生的支持，遂轉危爲安。

民國十五年，北方局勢大變。那時季鸞先生正徘徊於天津，徬徨無之。吳、胡二先生勸先生回上海，專門主持國聞週報，季鸞先生：「病其

爲週刊，不足滿勞動之欲，以爲必兼辦日報，庶幾可以迴旋也。」

正好由英欽之先生所辦的天津大公報於十四年冬停刊，三氏遂倡議接辦該報，以實現他們共同創辦新聞事業的素願。於是吳氏籌資五萬銀元接辦大公報，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續刊。從此之後，直到先生於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六日逝世，他都是以全副精神灌注在這一張新聞紙上。大公報經歷「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前後將近二十年內，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與季鸞先生所享榮譽之高，可以說在新聞史上有空前地位，舉世無二，唯我獨尊。所以，當季鸞先生逝世消息傳出後，真是舉國同悲，萬人拭淚；大公報於大陸淪陷後被中共劫持利用，也令人同聲惋惜，不禁髮指。至今老一輩人對這張報紙念念不忘的道理何在？實不簡單。

大公報上不朽文章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第一萬號，季鸞先生手撰「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詞」。其中對於大公報歷史、續刊時代背景與他們三個接辦這個報的旨趣，都有扼要陳述：

「本報創刊於清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即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以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廿二日發行滿一萬號，其去三十年初度，餘二十五日。同人謹於今日徵文中外，以誌紀念，而爲之辭，辭曰：

「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爲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

海內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強以救國，其工具爲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爲大公報，蓋創辦人英君敏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發刊以來，直言談論，傾動一時。現民國後，英君漸老，社務中衰。民國六七年曾經整理，營業再振，復因頓挫，至十四年多而休刊。現在服務本社同人之接辦，爲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英君創辦，承庚子八國聯軍奇禍之後，同人續刊，則當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之時，此三十年來，中國受內憂外患猛烈之壓迫，舊秩序已崩潰，新改革未成功，國民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之狀，實表現於社會一切方面。本報誕生成長於此時代背景之下，而前後同人復同爲親身經歷甲午庚子以來之痛史者。……現在同人等之出身報界也，早者始於辛亥之役，其晚者亦多逾十年以上。浪跡南北，株守徒勞。故於十五年天津反動政治最高潮之時，更毅然接辦本報，再爲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歲月忽忽，又數年矣，而所謂言論報國者如何？際茲紀念，悲愧交併矣！

「雖然，亦有可略告慰於國民者，自英君敏之創刊，以至同人接辦，本社營業，始終賴本國商股，不受政治投資，不納外人資本。同人接辦之日，深感於中國獨立的輿論之亟待養成，故進一步以徵資獨立經營，不爲一般之募股，負責同人並於約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職務。當續刊之第一日，當以四事詔告國人：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於國者，糾彈

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鈔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詁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以上四端，爲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勵之最小限，今者檢查過去，幸未背創辦人之精神，得勉盡同人公開之誓約。雖然，其志是矣，其效則微。……本社同人微論智力上應接不暇，即事實上亦障礙叢起，雖依時立言，勉效清談，然常有時不能言所欲言，或竟不免言所不欲言，其牢持斷航以與驚濤駭浪戰者，惟賴其無成見，無背景，不以言論作交易，不自甘於盲從、盲信、盲動、盲爭之一點精神，或足以邀天下之共諒而已。且因戰事屢興，營業損失，金價昂貴，打擊尤重，而因華北商業之蕭條，廣告發行，皆受嚴重之影響。營業既不能充分發展，而紙面之整理，新聞之充實，皆不能如計劃以行。同人等雖薄具經驗，志切改良，而限於環境及能力，實未能貫徹其理想於萬一。今當發行第一萬號之日，縱自省志趣未衰，而無奈成績太少。念各界之同情，感萬分之悚愧！

「本報於十五年續刊第一日，曾曰：『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爲國民

宣傳正確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以不媚強禦，亦不阿羣衆。』而其最後之結論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指示，忍耐步趨，以求卒達於光明自由之路。今當紀念一萬號之日，同人敢誓約於國民者仍如此。今後更願挾全國讀者之同情與援助，謹隨國民之後，努力解除國家人民之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一掃近世以來之內憂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國之成功。」

這篇文章，季鶯先生不但把大公報的歷史背景及發行趣旨，再度詔告國人，同時也說明了中國的現狀與努力的方向，字字珠璣，語語至誠，委婉動人，擲地有聲。我每次讀到這篇文章時，就如同嗅到一股馨香的氣息，昇華在宇宙之間，彷彿看見了季鶯先生的笑容，在對着人說那些謙遜而誠摯的語句。真是如沐春風，如浴化雨。我覺着這是中國自有新聞事業以來，談論自己，最有分寸，最有紀念意義的一篇上好文章，垂千古而不朽，爲萬世而立言。

全國輿論中的輿論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發生張學良規持蔣委員長的事件。這在當時情形而論，是影響國家存亡的一樁大事。輿論很可以左右全國的人心，大公報的態度更爲全國輿論中的輿論。十二月十八日，季鶯先生親撰「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使叛逆終於回心轉意，將領袖護送回京，接受國法之制裁。但是這篇社論實在不好措詞，軟了，變成求情，予對方以輕視心理，反而無補於事；硬了，變成刺激，火上加油，說不定會

逼出禍來。故必須入情入理，「恩威」並濟，以理性的感情，打動對方的心，才能成功。請看，季鸞先生是怎樣作這篇文章？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着，鼓盪着，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切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辛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灼着，祈禱你們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關內所餘的惟一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家多帶着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着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痛苦。所以你們的焦灼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樣大錯。你們心裏或者以為自己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的將士們突圍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以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

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罵！

「蔣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有招致不公平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早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各國都以為他為對華外交的中心。這樣人才與資望，決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

「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全國同胞們抗拒，這樣死了，救全國同胞雖可憐而不能見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極容易，在西安城內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

「我們是賣糧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

「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封公開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着西安，陰鬱的天空，趕快大放光明吧！」

我雖然只摘錄二分之一的原文，請大家看看，這在當時千鈞一髮之際是多麼動人有分量的文章！後來與當時領兵的東北將領談起這段經過時

，他們都這樣說：「我們在西安看見這份傳單時（中央在京加印的），一看便涼了半截兒！大公報不支持，還有什麼希望？但大公報說得有條有理，所以我們心裏有了數兒，不再操切，等待總司令（張學良）的決定。後來知道總司令看見這份傳單，也改變了主意。……」

雙十二事變，固然由於領袖的大德感召，臨危不懼的精神，使叛徒終於悔改；但大公報的這篇文章，有助於張學良與其部下的轉變，則毫無疑問。這是一篇莊嚴的歷史文獻，並非普通通俗的宣傳稿可比。這是一篇扭轉歷史的詔告，什麼文章會發生這樣的影響力？

揭發日本和戰陰謀

抗戰爆發後，政府於二十六年底，由南京遷重慶。其時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奉該國政府之命，調解中日糾紛。有一部份國人，鑒於首都即將淪陷，敵人正準備以大軍進攻武漢，不免意念動搖，徬徨無措，對於陶德曼的調解，有所企盼；但實際上，是日本另有陰謀，藉緩兵之計，企圖大舉。季鸞先生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在漢口大公報發表「最低調的和戰論」，揭發日本的陰謀，並法除國人的畏懼心理，使抗戰繼續下去，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那篇文章主要意思如下：

「昨天東京電：敵外務省發言人說：歡迎第三者調解，但同時東京已準備八十萬人的遊行慶祝，預備於佔領我首都之日舉行。大家只就這簡單兩條消息看看，就可以認識敵人如何玩弄辱沒

中國，並可以知道敵人所謂調解是甚麼意義。

「敵人所調解的意義，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統政府肯接受他佔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因爲如此省得他製造傀儡，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以自消滅國內之抗戰精神，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這於他太便利，太合算了，而中國怎樣呢？」

「我們是無黨派的報紙，向來擁護統一，服從國策，在開戰以前，從沒有一天以言論壓迫政府主戰，也從沒有附和一部人，年來所謂即時抗戰論，以使政府爲難。今年蘆溝橋案發生以來，認爲大難臨頭，更不容伸張私見，所以始終擁護蔣委員長在廬山演說之主旨，並開揚軍事上外交上政府屢次發表之正式聲明。所以自抗戰發動以來，一面鼓勵軍民抗戰，一面擁護政府在外交上的立場。因此之故，我們亦向不反對國際調解，亦並不反對外交上之多方運用。但事到今天，却不容不大聲疾呼，請求政府當局於最近發生的所謂調解問題應下明白之決心。我們以爲政府即日即時應當明白向中外宣佈，如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佔了南京，則決計不接受調解，不談論和平。我們以爲這絕對不是高調，乃是維持國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場。我們不問日本條件如何，總之一面慶祝攻佔南京，一面說和議，這顯然證明日本抹殺中國獨立人格，那條件之劣，就不問可知。且縱令條件在文字上粉飾過去，但實行起來，一定在實質上喪失獨立。因爲他若誠意議和，就斷不會攻我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統政府於失盡顏面之後，再屈服給他。敵人既存心如此，試

問怎樣和得下去？換句話說，怎樣屈得下去呢？

「國民政府遷渝之日發表宣言，說爲的是避免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固然可恥，但猶是政府在城之中。現在於第三者動議調解，我已聲明可以考量之時，而還要攻首都，並且大舉慶祝，這比逼迫我作城下之盟，其意義還要毒辣，其辱我欺我之程度，還更加幾倍了。……倘南京不幸被佔，應明白拒絕名爲調解實爲屈服之一切談論。我們應彌補政府軍事上的缺陷，大家誠意扶助領袖，在三民主義之下，不分黨派，同心奮鬥！這樣下去，或者被佔領地要出現多少漢奸組織，一如上海發現之所謂大道政府之醜怪傀儡，但那完全代表不了中國，完全是敵人負責，所以並不可怕。我們全國一切擁護國家獨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統政府，大家心安理得。這樣，中國就永不會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致衰落。」據我所知，當時政府雖遷重慶，但蔣委員長以下各重要人員却都在漢口。本來，蔣委員長已有堅拒日本「招降」的決心，等讀了季鶯先生這篇文章之後，立刻發表強硬聲明，拒絕虛偽的調解。

闡述中國報人特色

民國三十年五月半，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以大公報對於輿論所發揮的公正精神及對於讀者提供的優越服務，在亞洲新聞界獨樹一幟，至堪欽佩，特頒贈榮譽獎章。這是歐美新聞學術機關對於中國新聞事業首次頒贈的獎章，也是迄今三十年來尚係空前的一次。大公報接獲這項消息以後，自然高興。但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躊躇滿志，沾沾自喜。在重慶中國新聞學會及各報聯合委員會，特定那年五月十五日假上清寺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慶祝會。那天季鶯先生手撰「本社同仁的聲明」一文，他在慶祝會上的演詞，也就是那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您看他怎樣措詞：

「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贈本報榮譽獎章，這是中國報界的第一次。本社同人以其有關我國報界全體在國際上的榮譽，故決定託中央社駐美記者盧其新君今天代表接受。同時中國新聞學會及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特爲此事，定今天下午在重慶開盛大的慶祝會。」

「本社同人多時詳審考慮之結果，以爲若就本報而言，則對於米蘇里獎章根本不應接受，對於今天的慶祝會更不敢當。因爲深切自省：多年來並未能善盡報人應盡的責任，尤其在抗戰四年中，對國家社會太少貢獻。論冒險，斷不及上海同業；論勞瘁，則不如前線報紙。至於宣揚抗戰建國之大義，則不過勉隨全國同業之後，同心同德，亦步亦趨，此外並無特長。事實如此，何以能獨受國際的讚揚？更何敢勞同業之慶祝？」

「但最後我們的結論，知道此事的意義，並非這樣小。我們想：今天的慶祝會，其意義應當不是慶祝本報，而是慶祝中國報界在國際上得到同情的認識，及將來在國際上可以增進與各國報界尤其美國報界的合作。照這樣講，則本社同人不但必辭謝慶祝，並且應當參加慶祝。根據此意，謹發表下列的感想：

「第一、中國報業本來歷史短，規模小，國家地位又這樣落後，所以國際上多年不深知我們

報界情形。但我們公平論斷，中國報人的精神，在許多方面斷不遜於各國報人，或者還自有其特色。……何以說中國報人自有其特色？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我們同人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並且不求名。我們以為不求權不求財，是士人常行，容易辦，不求名却不容易。因為辦報都希望人愛讀，讀者越多越歡喜，名聲越大越高興，而危機也就在這裏。……

「第二、國際友誼靠報人維持，世界文化靠報人流通。……中國受侵略業已十年，大規模抗戰，業已四年。我們全版圖之半，被侵略者蹂躪着，全國到處受着轟炸，平民婦孺天天喪失生命，而日本報紙還說這是『聖戰』，是『共榮』，完全扯謊，毫不自省。我們因此，在新聞禮貌的意義上，感覺人類的悲哀。因此不能不呼籲全世界信仰正義與自由的報人，應當努力密切合作，動員全世界受自由及受侵略的一切民族，用道德的及一切的力量，共同抵抗侵略，以救世界。今天全世界的重心是美國，中美國交向來這樣好，中美人民互相信任，互有同情，而近時的美國輿論，業已決心毅然負起保衛人類自由的責任，對於遠東的關心，與對歐洲一樣。中國報界十分欽佩美國這種新的趨勢，以為這是黑暗世界中發現了光明。因此更願與美國報界互助合作，有所努力。」其餘季鸞先生無論對於政治、外交、社

會、文化，甚至於文藝方面都有特殊見解。尤其國慶日、新年與大公報的紀念日等，凡季鸞先生所寫的文章都特別動人，有其不同的內容。他所發表的文章，何止「季鸞文存」那裏能包容完全？他的每篇文章，不但文字流暢清麗，而且合情合理，不矯揉，不造作，同時令人心服口服，真是天才！筆者常說：「民國以來，文人論政，前者有梁啟超，後者有張季鸞，但以影響與貢獻而論，張氏實在勝過梁氏多了。」至今我仍持這種見解而毫無動搖。

病中仍每日寫社評

筆者初次遇見季鸞先生是民國二十二年夏天，在天津。他要我去東北作一次秘密採訪「偽滿建國周年」。我去了兩個多月，幸未辱命。那年九一八特刊，一大張有我的四分之三的文章。此後我便留在報館擔任「小公園」及本市編輯。半年之後，因我另有職業回到上海參加國聞通訊社工作，並為津館寫通訊。迄二十四年離滬赴漢，他每次去上海，必邀我相聚。一兩小時的談話，如沐春風，如膏化雨。他幾次要我辭掉另一職務，我以大局不安婉謝。二十六年大戰既起，大公報津、滬兩館均毀，在漢口復刊，我才又歸建。二十七年十月他派我去新疆，完全由於二十二年的秘密採訪所獲得的信任。我幸未辱命。其餘凡有重要採訪，季鸞先生都叫我去，如「訪蔣百里將軍」、如訪「拉鐵摩爾」等等。受知良多，愈增慚愧！季鸞先生自幼體弱，染有肺疾。在天津時代，就時常犯病，但一稍好，即不辭勞瘁

，寫文章、看新聞、改稿子，不遺餘力。先生以憂國憂民的心腸，以服務人羣之志願，對於任何事都有興趣。先生擅崑曲，亦精皮黃。字寫得有帖式，但從不以此誇耀。二十二年秋，我在天津館替何心冷編小公園，並為他去世出紀念刊。有一段時期，政之、達詮和他三位先生都在津門。彼時達詮先生已是小四行的總裁了。每天晚飯後，圍坐在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八一號報館大編輯室的一張橫桌邊，一邊包着花生米，一邊談論新聞電訊的內容及當天要寫的社評（注意別稱「社論」，只有大公報稱「社評」），然後決定了題目與大體的內容，便由一個人進到小房間去執筆。他們那時都在四十歲左右，情趣極佳。這種情景至少有一月之久，被我瞧見，迄今猶如目前。

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後，他帶着曹谷冰、孔昭愷三五人由滬間道至漢，倍常辛苦，曾臥病多日，但在病中，他選天天寫社評。一方面人少不足支配，另一方面他責任心重，又當報館恢復之初，必使華中讀者對大公報提高信心，所以不能不由他親自寫社評。果然，大公報不久就贏得了武漢三鎮讀者的信賴，報份日增，人人爭讀，成為當地人民首要的讀物。

到了重慶，也是由張氏領導。因香港版由胡政之先生負責。後來香港版停止，移桂林。重慶新豐街的館址被日機轟炸被毀，遷李子壩，張氏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竭力支撐，幸不久又復原狀。筆者也忝隨同人之後，與報館共渡危難。

不平凡而動人時刻

一本高水準的月刊

宋晞

中外雜誌是國內歷史較久高水準的月刊之一，自民國五十六年創刊，迄今已發行至第四十一卷。自篇幅來看，由初期的五十多頁，到現在是每期一百五十頁。由內容來看，自第四卷開始，所刊文章按性質予以分欄，計有「中外古今」、「懷舊憶往」、「中外論壇」、「人物傳記」、「現代史話」、「中外學府」、「海外遊踪」、「軼聞軼事」、「留學專欄」、「健康之路」、「學術論著」、「河山戀」、「搜奇錄」、「萬花筒」與「兩地書」等。

我有幸經常閱讀該刊，也偶而為該刊撰稿，可以說是讀者兼作者。對有關歷史性的事件與人物之報導特感興趣。該刊的文章以人物傳記方面佔的比例最高，如王康的「小諸葛白崇禧」、王嗣佑的「泰國總理他儂元帥」、邵鏡人的「南通狀元張謇」和羅時實的「柳翼謀及其學術諸友」等是比較完整的傳記。勞幹的「記袁守和先生」和「記朱家驊先生」、周昆田的「懷念吳忠信先生」、趙龍文的「懷胡宗南先生」、張目寒的「溥心畬二三事」、田炯錦的「懷念于右老」、沈剛伯的「悼念羅志希先生」、李安的「懷姚從吾先生」、錢穆的「紀念張曉峯吾友」與宋晞的「我所敬仰的郭秉文先生」等，則是懷舊憶往的成份居多，也是人物傳記的一部分。還有自傳性的回憶錄，如謝冠生的「童年回憶」、阮毅成的「青燈有味是兒時——我的童年時代」與「我的青年時代」、田炯錦的「青年時期的我」與李樸生的「民國前後讀書生活」等，不勝列舉。

說到海外遊踪方面，也有不少佳作，如龔運舞的「舊遊憶瑞士」、何聯奎的「倫敦雜感」、郭賦的「旅美觀感」、劉方矩的「開羅最後的一日」、薛人仰的「訪美見聞」與李先聞的「赴沙烏地亞刺伯種水稻」等。國內的遊踪則以「河山戀」名之，如周昆田的「喜馬拉雅山去來」、田炯錦的「故鄉史蹟漫談」、羅時實的「花谿憶語」、楊森的「貴州雜憶」與勞幹的「關中雜憶」等。就現代史話來說，王社長成聖有「六十年來的中國」長文，在該刊連載，而後出版專書。他如洪軌的「民國十六年江西四二反共之回憶」、萬耀煌的「西安事變身歷記」、曹聖芬的「從溪口到成都」、樊琪的「抗戰時期的驛運奇跡」、與羅列的「憶念伍韜先生並自述脫險經過」等文，均與現代史有關。就中外學府來看，也有不少名篇，如羅時實的「南雅懷舊錄」、張其昀的「南高的學風」、戴運軌的「中大遷校艱苦談」、程其保的「清華創校初期史略」與楊希震的「政大遷校與大邑之戰」等。

我選列出上述的文章，不過是舉一反三，可以印證王社長所說：「二十年來，以中外雜誌和時代文摘的有限篇幅，居然也能推出了將近五千萬字的力作，承蒙四千多位作家惠賜佳作，發行四百多萬冊書刊。為我們這一個大時代，留下了不少優美、珍貴的紀錄。」

這實在值得驕傲。以我過去辦英文中國季刊 (Chinese Culture, a Quarterly Review) 達二十二年 (一九五八—一九八〇) 的經驗，辦好一本期刊，稿源非常重要，有了充裕的稿件，才能有所選擇，使內容逐漸充實，也才能做到按期出版。除了內容精彩以外，如果校對不精，也會影響刊物的價值。中外雜誌的錯字甚少，編排印刷也力求精美，更難得的是確實做到按期出版。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際此中外雜誌創刊二十週年前夕，書此短文為賀。

張氏於三十年起即犯病甚重。其初養病城內，後移汪山康心如先生別墅。筆者當時正寄居南岸黃槐埡鎮，距離汪山康寓約五華里，常於假日步行去看他。他臥在病榻上，仍天天閱報，並與訪客談論世界局勢。季鸞先生本是日本通，與日本朝野友人甚多，但自抗戰起，他就不斷揭發日本人的性格，鞭辟入裏，十分深刻。三十一年，日軍由贛北經湘侵犯廣西，三十三年一度佔領貴州獨山。其勢兇猛，大有不可擋之勢。但季鸞先生早已料定日本必敗，故病中對時局抱樂觀，臉上不時浮着笑容。常去汪山看他的有谷冰、芸生，還有王芃生等。蔣委員長也常派人前往探問。當時，先生的肺病已漸入嚴重階段，所以一面與人談話，一面咳嗽，而且痰很多，有血塊。以今日醫藥來衡量，絕對可以挽救其生命，可是那時沒有治肺病的特效藥，所以於三十年九月六日去世。汪山康寓，享年僅五十五歲。氏續娶上海籍某氏，生一子，屬龍，乳名「大龍」。後移靈歌樂山中央醫院。開弔之日，蔣委員長特贈「一代師宗」輓額，並親往嘉陵賓館靈堂弔祭。啓靈赴西安之日，執紼者數千人，歌樂山與山洞之間，籠罩在烏雲之下，瀰漫着一片悲哀的氣氛，偉大行列都是恭送這位報人的崇拜者！那真是不平凡而動人的時刻！

張氏安葬於西安附近的翠華山下，當時坐鎮西北的胡宗南將軍，對葬事褒贊尤多。四十年多來，每思前情，決志有所報答，却因人事匆匆，言有未盡，難以表達對一代哲人敬愛於萬一。此番短記，仍不過是僅略補遺憾而已！